

# 新評論

半月刊



第七期

目錄

政治思想中的人性論……吳恩裕

論五四運動……劉振東

評大公報……儲安平

德侵丹挪……王繩祖

編輯後記……編者

【本刊零售一角二分】

【半年連郵一元四角】

【全年連郵二元七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日出版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七號

發行編輯者  
新評論社  
重慶南泉五號  
重慶來龍巷六號  
編輯部  
發行部

本期文字由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雜字第一六二六號備查

## 政治思想中的人性論

吳恩裕

人性論在政治思想中佔很重要的地位。一政治思想家的整個政治思想系統，常受其自己的人性觀之影響。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馬克斯的人性見解和斯賓諾莎、盧梭、康德、邊沁等的人性觀的關係。馬克斯對於人性問題，採取一種具體的看法。他這種看法和以上諸人都不相同。我們先講康德的看法。康德在他的倫理及政治學說中，都極重視「善意」(Goodwill)一觀念。「善意」在他的抽象人性研究中，是基本的觀念。照康德的主張，人是，或至少應該是，沒有慾求和希望的；他們不求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而祇求履行道德的義務(Moral obligation)。所謂道德的義務，既非快樂，也不是與快樂相似的東西；乃是由實現「善意」後，所得到的任何結果。「善意」的實現，其結果一定是善的，因為他是根據至高無上的「無條件的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而產生的。「無條件的命令」告訴我們：「須依照你自己認為可成一公律之箴言去做」。(註一)康德的理想的「至善」，就是由道德觀點看，「應該」(ought to be)做的一些事情。

在馬克斯看來，如果康德認為實際上的人，「本來」具有他所謂「善意」，則康德不免看錯了實際上的人性。馬克斯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人類具有的意志並不是「善意」；而是「物質動機化的意志」(materially motivated will)。

(註二)人是自私自利的，毫無所為的「善意」，是不會有的。所以康德這種說法，是把人與其實際生活情形給割裂開了。退一步說，如果康德認為人「應該」具有他所謂「善意」，——因為必須這樣纔能產生善的行為——這倒不失為一種道德理論。但假如人性若「本來」是自利的，亦即物質動機化的，則這本來的成分，誠如休謨所說，是不會發「善意」代替了的。(註三)因此，康德那個理想的至善，祇有他自己想像中之具有「善意」的人，纔能實現。並且祇有用他那種形上學的演繹法，纔能使其實現！有人說：「康德在他的倫理學中，假設了一羣聖人的社會，或至少是道德哲學教授的社會」。(註四)這是一個很恰當的，並且具有諷刺性的批評。

馬克斯在他對康德的批評中，(註五)提示兩個要點。第一、大凡一種倫理或政治學說，不應陷於以下的錯誤：即把人由其具體環境中抽出來，因而忽略了他的實際生活情形。第二、一種倫理或政治學說，也不應假設一個常人所能達到的理想的「至善」，使一般人只能感到「仰之彌高」，而不可趨赴。

馬克斯對人性的見解，和邊沁的「趨樂」(pleasure-seeking)「避苦」(pain-avoiding)的「心理算盤」(psychological

Goldfish 就是俗語：「不要爲一兩文錢打算盤」中的那個「算盤」。也有所不同。馬克斯固然承認邊沁比康德較爲切實；因爲邊沁確能將人性問題多少在唯物論的立場上把握一些。功利論認爲：人性並不是形上學的抽象概念，絕無任何慾求。

反之，人性乃是受兩種主因所支配的。這兩種主因便是「樂」和「苦」。如果把邊沁的人性見解叫做唯物論，我們應該名之爲「心理的唯物論」。因爲「苦」「樂」是心理方面的事實。大體上說，誠如拉斯基先生所言，（註六）邊沁的人性觀和馬克斯的見解，是有相當關係的。但邊沁祇是空談「苦」「樂」本身，在馬克斯看來，這仍不過是談抽象概念而已。用勞滋 (Lutz) 的話說：「如果我們不知道所享受的是什麼，快樂本身是個不完整的思想」。（註七）馬克斯以爲最重要的：我們要去考察那個實際的「快樂或利益的尋求關係」(Pleasure or Interest-seeking relation) 這個實際的關係，

是受經濟的及社會的條件所決定的。我們不應該把快樂或利益本身，與人們取得快樂或利益的能力，混爲一談。講快樂與享受快樂，純然是兩回事。借用斯賓諾莎的話說：「沒有金錢觀念之基因相伴的任何種快樂，都是不可瞭解的」。（註八）邊沁固然在「一方面很切實地警告我們：不要把虛構的 (Fictitious) 社會利益，和實在的 (Real) 個人利益相混。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不能把不同的個人集團的利益分別看待；尤不能把快樂或利益本身，與取得快樂或利益的力量分開。

馬克斯在他對邊沁的批評中，也暗示兩個要點。第一、一倫理或政治學說，不應把「苦」「樂」本身，當做人們之

間的實際苦樂關係。因爲前者是抽象概念的問題，後者是能否取得快樂避免痛苦受經濟力所決定的問題。第二、一倫理或政治學說，更不應把某一具有快樂特權的階級 (Disadvantaged class) 本文著者按，此即指富人) 之特殊利益，當做所有人們的共同利益。（註九）

斯賓諾莎代表另一種心理的唯物人性觀。在某一意義上，可以說斯賓諾莎是一個功利論者。（註十）他不但把「善」(Good)「惡」(evil) 解釋爲「有用」(useful) 與「無用」(no use)（註十一）或「樂」與「苦」，（註十二）並且他認爲：「善」，「惡」，「苦」，「樂」，「有用」，「無用」是可以計算的 (calculable)。（註十三）斯賓諾莎認爲「下面的事實乃是一個公律：即沒有人能放鬆他所認爲是善的東西，除非他爲了得到一個較大的善 (a greater good)，或爲了較大的惡 (a greater evil)」。也沒有人能忍受惡，除非爲了避免一個較大的惡，或爲了取得一個較大的善。任何人在兩個善中，必擇取他自己認爲是最大的善；在兩個惡中，必擇取他自己認爲是最小的惡」。（註十四）斯賓諾莎認爲「這個律根深蒂固地生長在人們心中，我們應把牠算做一個永久的真理與公例」。（註十五）但斯賓諾莎却很了解人們對於善惡判斷的主觀性。所以他說：「我審慎地說某人自己所認爲之最大善或最小惡：因爲，這並不是說他自己判斷的正確」。（註十六）以上的見解，和邊沁的「心理算盤」，很有相同之處。

斯賓諾莎的人性論並不是建築在主觀感覺之「苦」與「樂」上；而是建築在心理狀態之本身的「情緒」(emotions)

上面的。這一點和邊沁很不相同。他認為「自求生存」的衝動 (conatus sese conservandi) (註十七) 是一切情緒的基礎。霍布士也講「自求生存」的衝動。在這一點上，斯賓諾莎與霍布士是很有關係的。(註十八) 自求生存」的衝動，是所有人類活動的基本動力。牠是與生俱來的，自然而然的。斯賓諾莎認為政治學者必須確切地認識這種人性，然後才可以制定出來能在實行方面有效的學說。誤認這種人性的性質是不對的；同時譏評這種人性也是不對的。因為這是事實，凡理論家如欲其理論有效，必不能忽略既有的事實。(註十九) 斯賓諾莎以「自求生存」的衝動為核心的人性觀，對於倫理學及政治思想的影響很大。在倫理學方面，他認為：「沒有一種美德能被認為是比這自求生存的努力，更為佔先的」，(註廿) 並且人愈能努力於求自我生存，則其人為愈有美德。(註廿一) 這樣，則「本來」的人性實無所謂善惡；一切德目都是後起的東西，都是順着這個基本衝動而制定的。在政治思想方面，斯賓諾莎認為政治上「至善」(chief good) 是「保持國家的存在」(註廿二)。因為國家對人們有利益，牠可以使人們更圓滿地實現其「自求生存」的衝動。(註廿三) 這樣講來，則國家的存在也是順着人性的自利行為。

關於「自求生存」的衝動，為倫理政治學說之基礎一點，斯賓諾莎的人性觀和馬克斯的見解，發生一個有趣的比較。馬克斯固然講過斯賓諾莎的「倫理學」(Ethica) 及「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註十四) 但他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斯賓諾莎以「自求生存」的衝動為

基礎的情緒論。馬克斯曾批評過斯賓諾莎的本體概念。(註十五) 他又講過某階級的「情緒」，在社會發展的某階段中，會感到舊的社會組織是一個羈絆 (fetters)，並且想衝破牠。(註二十) 在馬克斯看來，要想有社會的意義，我們必須在「情緒」的社會背景中研究牠。否則，我們無法知道「情緒」的社會作用和功能。斯賓諾莎對「情緒」之心理的研究，可謂與「情緒」在社會中的功能，沒有關係。這便是心理的唯物人性觀的區別所在。

雖然兩人的學說在此方面不同，但「自求生存」的衝動在斯賓諾莎系統中的地位，却和「物質的生存形態」(material mode of existence) 在馬克斯系統中的地位，極為相似。在人性觀方面，馬克斯認為凡人皆具有「一般的人性」；同時也有「人性在每個特殊的歷史時代中的變化」。(註二十七)

馬克斯對「一般的人性」的研究，採取外在的觀點。他所注意的，是表現在社會事實中的人性。在他看來人性並不是一個先天的，現成的模型；反之，乃是一件在社會中可以觀察出來的事實。這件社會的事實中，包含着「一個心理的趨向」；此趨向是會對經濟決定的「利益刺激」(Interests-stimulate) 引起反應的。除了由其具體的表現外，我們沒有方法研究人性。「人性」一詞本身，似乎即暗示有一種抽象的人性。這正是哲學家們想像中的「本來的」，「純粹的」人性。但在事實上却是沒有這種人性的。由這方面說，「人性」一詞是有些語病的。我們如果仍欲採用「人性」一名詞，則我們認為祇有「關於人性的些事實」(facts of human nature)。所謂「抽

象的人性」，乃是一個由不合邏輯的思考過程而推演出來的概念。由表現在社會中的事實來看，馬克斯認為「一般的人性」之根本規律便是：就社會事實的表現，可知人類本質地 (intrinsically) 且永恆地 (persistently) 具有一種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的生存形態的趨向 (a tendency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ir material mode of existence)。 (註二十八) 這是關於人性的基本事實，因為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這是一個自然法則，正如「一個國家要停止工作就要滅亡」 (註二十九) 一樣，一個人如果喪失了其物質的生存，即等於沒有生存。馬克斯以為「沒有一個自然法則是可以取消的」。 (註三十) 由馬克斯認為「一般的人性」不變一點言之，他這種見解很像休謨 (Hume) 的主張。休謨以為「人性中之物質的成分」 (anything material in our nature) 是不能改變或更正的；「我們至多能改變我們的環境與情境」而已。 (註三十一) 用休謨的話講，馬克斯之「一般的人性」就是人性中之「最物質的成分」。這種成分根本不能取消，因為取消了牠，人即不成其為人了。

現在我們先把馬克斯的「物質的生存形態」，與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之衝動」比較一下。馬克斯認為凡一倫理或政治學說，若想社會地有效，他必須把這種人性當做大前提。正如：斯賓諾莎主張任何道德原則不能先於「自求生存之衝動」，離開了「自求生存之衝動」任何美德都不可了解一樣；馬克斯也主張：任何權利及義務的討論，必須先考慮人們的「物質的生存形態」。有意或無意地忽略這基本事實，任何

倫理及政治學說，都不會行得通。例如康德便是有意地忽略這種事實的道德及政治理論家，他未嘗不知道人性中有自私的成分，但他却假定「善意」一觀念為他道德哲學的基礎。這種辦法是把人性用規矩來繩墨。馬克斯以為這種辦法是不會普遍有效的。這僅可代表一種空想或希望而已。馬克斯認為人的意志是「物質動機化了的意志」。祇有在這種人性中，我們纔能找到「苦」、「樂」、「利益」等範疇的來源。一思想家如果忽略這件事實，則將如斯賓諾莎說：「他不是在做研究實際上的人類，而是在研究自己所願意那樣的人類」。 (註三十二) 如果一社會理論忽略或否認了實際的人性，牠是不會有用的。

就以上看，馬克斯與斯賓諾莎在這一點上，固然頗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其根本的差異。馬克斯，因為他自己站在經濟決定論的立場，必要把人性的問題，進一步拉到他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去。祇要我們是在討論倫理或政治學說，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之衝動」一概念，必須翻譯成一件社會的事實——馬克斯的「物質的生存形態」。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這是馬克斯和斯賓諾莎的不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自求生存之衝動」可以說「物質的生存形態」的一個理論的假設，但這並不是說前者比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前者祇可做後者的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在馬克斯的社會學說中，可以不必去這個理論的假設，而無害處。那就是說，當研究人類的社會活動時，馬克斯可以祇研究在社會中可以觀察出來的事實——人們的「物質的生存形態」，也就

盧梭的著作對於馬克斯的影響很大。這一點我們可由馬克斯早年的作品中看出。(註三三)當馬克斯研究自殺現象的時候，他說：「這個社會不是一個社會，誠如盧梭所言，牠是一個野獸所居住的荒原」。(註三四)此即可為一證。但馬克斯下面接着下去的話，便和盧梭大異其趣了。他說：「當我研究警察行政組織時，我會特別注意自殺的案件。我會探求：是否能以減少自殺原因一辦法，使自殺事件減少。我對此做了好多工作。結果我發現：若非把現代社會秩序整個的改造 (total reform of the present social order) 所有其他企圖，都是無效的」(註三五)盧梭那裏會夢見這種「整個的改造」？反之，盧梭在政治思想上的工作，祇是：擁護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至於經濟的不平等，盧梭和其他社會改革家一樣，他祇希望「沒有一個公民能富到購買其他公民的程度；沒有一個公民能窮到不能不出賣自己的程度」。(註三六)

關於盧梭的人性觀，馬克斯以為勿雷霍布士的「人與人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倒比盧梭的見解，比較近於事實一些。(註三七)盧梭主張人性本來是並且內在是善的(註三八)自由的和獨立的。(註三九)盧梭的觀點，用狄曠 (Dreux) 的話來說，乃是「關於人性的一個純粹形上學的命題」。(註四〇)對於人養生而自由的，獨立的，的見解，馬克斯的批評是：「隻身及與世隔絕的獵者或漁人，乃是司密斯 (Smith) 和李嘉圖 (Ricardo) 學說的出發點。這見解已經屬於十八世紀不合事實的幻想了」。(註四一)又說：「盧

(contract) 而發生相互關係」，也僅僅是個「虛構」(fiction)而已。(註四二)

據馬克斯的見解，在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過程中，人類必須彼此依賴地去生產他們相互的生存手段。(註四三)這是一件歷史事實，一個所有歷史的基本條件。就祇是爲了保持人類的生命，這件事實在今日，正如在幾千年前一樣，必須時時刻刻地使其實現」。(註四四)那就是說，只要人類想活着，他們必須在生產及利用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上，互相依賴。馬克斯這個論據，顯然是歷史的論據。在此史的論據中，他一方面否證了霍布士性惡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否證了盧梭想像的性善的意見，由馬克斯認人類物質的生存形態之根本性 (fundamentally) 一點言之，馬克斯和斯賓諾莎一樣，也主張道德的形容詞 (moral adjectives) 如善，惡等，不能用來界定 (define) 人性。因爲，照邏輯上講，界定的分子 (defining factor) 必須比被界定的分子 (the defined)，較爲根本 (more primary) 所謂善，惡，不過是些道德的觀念，他們在邏輯上，既不比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的本能」(prior to)，也不比馬克斯的人們之「物質的生存形態」佔先。對於保持人們的物質的生存形態這件事來講，善，惡這些形容詞，根本是無用不上的。如果一政治學說，假定根本的人性是善的或是惡的，並且照此假定去決定政治的指歸，則這個學說，一定不會有用。因爲事實上，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人性祇是需要活着而已。用馬克斯的話

## 評 大 公 報

儲安平

本文作者企圖對重慶各報作一概括的論評。此項工作，頗覺繁重，因之不得不稍自限制，將其範圍暫限於渝市幾個主要的報紙。報紙原為改造社會之工具，但報紙同時又為一種社會之產物，故其自身亦常有可資改造之處。據中國新聞事業為吾人平生一貫之目的，此文之作，即本乎此項目的而來。但前此既未見有人担任此項工作，則本文作者于行文之初，勢不得不謹慎從事。吾人之論評，當力求其公正與客觀，文字亦務求溫和，避免過於鋒銳。本篇先論大公報。

大公報是近十年來中國最有權威的一個報紙。我們常研究這個報紙何以能有今日這樣的成就。一個事業的成功，其原因與條件，本不止一端。作者常覺得，主辦大公報的人，都有一種「當它一件事物在做」的那種事業精神。這點十分重要。我們常常有一個信念：「事在人為」。無論是一個團體，或一種事業，祇要有人兢兢孜孜地在那兒埋頭努力，則這個團體必定發達，這個事業必定成功。其例隨地皆是，毋庸列舉。現在辦一個報紙，至少要有四個條件，即編輯人才，管理人才，經濟力量及社會力量；前三者尤為基本。大公報這一付「架子」能撐得起，撐得有實，得力于此三方面人力的平均；而規劃這三方面的人，又都能盡其職責。這編輯、管理、經濟三部分負責人物之間的前兩者，常是實際參加報紙日常工作的人。大公報這兩部分首腦人物所表現的精神，是專心有恆，慘淡經營。他們似乎都能以小我為輕，以團體為重；以私利為次，以事業為先。所以十餘年來，他們在中

途既未跨入政界，亦未改謀他業，個人生活之清苦，亦能無所介懷。中國社會上原有一種特異的現象，就是私人企業，常比公家事業容易辦，容易辦得有成績。公家事業的管理，往往發生下述的兩種情形：一、主持人物常易受到政治上的更替的影響，因之他對於這一事業的規劃，便不易不放棄亦不願放手去做；二、其主持人物的任命，常帶有一種「人」的關係，非為私人企業之能純以「才」為標準，因之所任命之人員對其所從事之事業，或無專門的知識，或無足夠的才幹，或者根本就是一種官僚；沒有一點熱情信心以及事業的精神。以言報紙，當亦未能例外。大公報是一個私人的企業，所以人才的任用，不僅較為自由，抑亦較為穩定。這一個報紙領導人物以及服務於這一個報紙的人員，他們的志行信則及其十年如一日的那種認真不懈的精神，固然可佩，而其環境，要亦易於使人發揮此種事業精神。

祇是此種事業精神，雖然難得，但並非大公報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因為這種事業精神，為創辦任何事業最基本的條件，除此而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創辦某一事業的人，必須對該一事業的本身懷有正確之理解與遠大之眼光。就以辦報而論，上海有許多報紙，辦得亦很發達，他們若無吾人上述的那種事業精神，易克至此。但是新聞企業與其他企業不同，新聞事業非僅以牟利為目的，所以營運即使發達，

贏利即使豐富，亦不得謂之「成功」。原來辦報有兩個方面，一是「商業的」，一是「文化的」（「政治的」包括在內）。在發行，廣告，以及管理上，必須應用商業上之最高原則，即科學管理。新聞企業既是一種企業，自不能違反任何一個企業所必需接受的「財政的觀點」。但除此以外，一個報紙便應盡量在「文化的」方面着眼。否則容能賺錢，必無權威。一個沒有權威的報紙，在我看來便是一個失敗的報紙。這一層，辦大公報的人所見最正確，亦最看得遠，他們並最懂得：他們所辦的是一個「報」。關於這一點，吾人尚須伸論如次：

第一、辦報因須同時注意「商業的」及「文化的」兩個方面，而後者實遠較前者為主要。報紙具有輿論的威力，所以它對於它所發表的言論，要審慎從事；報紙有教育的責任，所以它對於一切新聞的選擇，要細心嚴謹；報紙的讀者是知識階級，所以它所釐訂的文化水準，要高要嚴肅。凡此各點，大公報類都有很健康的表現。我們不大在大公報上讀到任何下流的黃色新聞，它所刊載的新聞及其標題，都很莊重而純正。大公報又是一個以「社評」起家的報紙，在天津時代，他們對於這一部分，顯曾以最主要的精力灌注了下去。同時，一個報紙所刊載的文章，其品質的高下，足以影響這一報紙的地位，所以大公報在天津時，廣約國內學者，撰述專文，或編輯各種副刊，選用文字，頗見嚴格。一個報紙的文化格律越高，這個報紙的身份也愈高，所以他們在文章方面（包括社評，專論，以及各種副刊），十分嚴謹，不敢疏忽。他們已明白辦報的三昧，而正確地把握住了努力的重心。天下

無論做什麼事，本來都有「內行」「不內行」，而所謂「內行」「不內行」，又常在看似不重要而實出入很大的地方表現出來。本文作者數年來有一個不變的印象，就是覺得辦大公報的人最懂得如何去宣傳他們的「招牌」（此點後面再提），如何去增加他們報紙的身份。「內行」之一種解釋，就是以最小的代價去獲得最大的收穫。而對這點，大公報有高度的表現。舉例言之，大公報在天津時，約有若干學者，擔任「星期論文」。據說該項論文，每篇稿碼五十元。假定所傳是實，則大公報每月所費，不過二百元，而這四篇「星期論文」因其作者都是在國內負有時望之人，大公報無形中自亦隨增高了自己報紙的聲譽，這是何等合算。回憶本文作者回國後，曾獻議於其所服務之報社，請邀約十位至十五位有學術聲望而其政治立場又與該報不相違反的學者，每月撰寄論文一篇，每文二千字至三千字，每稿致酬二三十元，在報館則僅月費二三百元，而報紙則每隔一日或二日，可刊載一篇相當結實的專論，其影響於報紙的內容，精神，以及聲譽，所受賜惠，實遠在此區區數百元以上，可惜事業家與官僚的精力見解，各異其趣。

第二、報紙是一個新聞紙，對於新聞或者任何有時間性的材料，自須以最大的努力去獲得。中國新聞事業在初創時期，資本薄弱，因之吾人不能在這方面高談苛求。祇是我們雖然不能希望中國的報紙，像歐美報紙的那種作風，對中外重要新聞，大量的迅速採辦，但我們却須具有「求做好」「求盡心」的那種精神，關於這點，大公報亦有相當的表現

。譬如在一九三六世界運動會時，他們雖無特派記者，但事關早在柏林方面約好專人通信。一九三七年英皇加冕時，他們也在事前有充分的準備。在這種地方，我們不應以一個報紙它們發表的材料來作評論的根據，最重要的還應該考察這一報紙其編輯部負責人物是否對當前大事在密切注意與認真規劃。大公報派訪員前往西蒙考察，這是四年前最引起國內各方注意的一次「通信」。大公報那次的選派訪員赴西蒙考察，其事實大受吾人之贊美。據說西蒙一行，報館所負擔的開支，凡數千元。然而我們認為大公報因西蒙通信而增加之信譽，決非此數千元所能衡其價格。其要點不在此項通信之充實或引人注目，就報紙而言，其真正之意義，乃在反映大公報所具有之眼光與魄力。西安事變後，大公報立派訪員飛赴西安，尤在中國新聞界中，寫下令人贊嘆之一筆。

吾人曾讀美國名記者Linton Wells自傳Blood on the no. (一九三七年)，自述其採訪新聞之經歷。其中一則云：

幾年以前，有一隻郵船火放警報，由檀香山作虛女航到美國去，在離洛杉磯七百英哩的海上發生火災。過了不久，電訊報告，說美國陸軍運輸艦滿士號已經把旅客全數救起。我當時打無線電報給滿士號的艦長，要求他允許我在中途登艦搜集新聞。他拒絕了我。但我依然不覺，雇了一架水上飛機，啓程去追逐那艘運輸艦。飛行了九十分鐘後，我終于看見了滿士號。機師把飛機降落到水面上，我經過極冒險並艱難的游泳，才接近軍艦。他們放下軟梯，我爬了上去。上船之後就給艦長痛罵一頓，他要我把飛機上的監視器，換來我竭力解釋說這是我新聞報導上的必要舉動，他才息氣滿意，許我和那些旅客講話。後來又經過同樣的艱難，回到水上飛機去。當我飛過滿士號的上空時，看見那艦長還在憤然揮拳擊頭向我揮動着。我則揚手向他道謝。四小時後我已帶了那次郵船火災的照片和

遇難者的自述記錄報告洛杉磯，馬上把我搜集所得的資料整理出來。此則案錄於早了十二小時。(節譯)

當然，如此故事所述，不要說我們現在做不到這種地步，就是歐美新聞界中，也有幾個人能像Linton Wells一樣呢？但是我們所需要師法者，並非此故事之本身，乃是他那種精神。作者常覺得，辦報必須拿一種作戰般的精神去辦，隨時都在緊張之中。要兩隻眼睛睜大着，一霎也不敢，靈密切注意着各個角落間所發生的大事，而以最敏捷之精神處置之。因此，作者又復憶及一事，其昔日所服務之報社，有分社設于長沙。長沙大火，那個分社自大火中撤退，這是世界上何等有權威的第一手材料！該報總社編輯部的負責人物，于接到分社人員自某地發來的平安電報以後，理應以最迅速的之行動，去電分社，囑其電告詳情。辯者或謂在目前之環境，此種新聞未必允許發表，因之亦不必作任何努力。但該報于長河大火後之二三星期，接獲分社一職員自動發來一敘述脫險之文字，亦照樣發表，未曾發生任何「問題」，可見此種解釋，並不充分。但當時該報編輯部之負責人物一混而過，無所主眼。在最能表現一個人的見解，能力與抱負時，司其位者不能有所作為，實為最可惋惜之事。但作者提出此點，其注視點並不在此一事件之本身，而在這一類情形所代表的精神；潛伏的精神實遠比表面的行為為重要。

第三、報紙之為物，須與社會揉合膠緊。它一方面反映全部社會之活動，一方面其自身又須插入此活動之中，報紙不能孤獨地超離于社會之上，不能單將通信社的稿子，在印刷

橋上轉一個手後輸送社會——它和社會的關係，不能僅僅讓樓簡單；它也不能讓它的言論在社會上隨便發生任何可能的反應——它所需要發揮的威力，不能僅僅那樣被動。報紙在社會上的活動，不僅是消極的，同時應該是積極的。所以歐美美的報紙，除了傳佈新聞，論評時事以外，並更實際地參加或發動許多社會活動。一方面，藉報紙的力量，在一切活動中獲得他人所不易有的方便，一方面復因此種社會活動的實際參加，報紙的勢力益更隨之而廣大。在歐美社會上，有許多運動，如慈善事業，健康比賽，文化展覽等等，常由報紙出而領導。此種社會活動，以服務性質居多數，所以報紙並不能直接從此種活動中獲取利益，有時甚或反要賠貼廣告以及人力文具等上的消耗。故此種社會活動或社會服務，視辦報為做官之人，當然不屑為之，視辦報為做「生意」的人也毫無興趣。其實，眼光若稍遠大，辦報的人若將這一個報紙作為一種事業去辦，便必須多多參加這種活動，因為在無形中，報紙的勢力將隨此種社會的活動而伸張。

過去中國報界，似以大公報對於此點，最著看得透澈。據我的印象，大公報常不放棄這種社會活動或社會服務的機會，有時不僅參加，且起而領導。如一切災難的賑濟，傷兵的慰勞等，大公報常表現出它所具有的熱忱。大公報在漢口的演劇，在重慶的捐獻滑翔機，都是參加此方面活動的表現。即就代收捐款而論，大公報過去似曾有幾次得到很大的成績。其實此種地方最足以獲取讀者的信仰。經辦此種捐款代收，必須報館具有熱情，同時又有嚴密的組織和負責的態度

，而熱情，負責及信用，常為獲取他人信仰之原因。一個報紙要發表一面為漂亮的評論，令人折服，其事甚易，一個報紙要讀者傾心相託，其事較難。如讀者對此報紙發生了信仰，這報紙的言論亦必更易發生力量。

作者在前面提到，大公報實最懂得如何宣傳他們的「招牌」，陳獻滑翔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其實此機都是該報讀者所捐，大公報不過經手其事。但我們認為一個領導的功臣，應享受其所得之報酬。所以我們對大公報此舉，不僅無所評議，反而中心贊佩。作者的看法，中國將來經營報紙的人，對於社會服務這一部工作，應具遠大的眼光，不要以為其事僅係義務而無取收穫。就國家社會而言，今日中國正需要這種熱血份子服務社會，就報紙而言，這也是發展自己報紙的一個最有力量的方法。

我們上面說過，大公報是一個以「社評」起家的報紙，因之吾人又嘗研究大公報的社評何以發生這種力量，而覺得實由於下述的幾個原因。一、大公報的精神近乎「*liberal*」而其性質又是一個私人的報紙，故其說話的環境比較自由，同時它也能說幾句大家所要說的話。其後大公報在社會上的地位與信仰日見深固，所以有許多事情，別人不便說的，它反有胆量說幾句老話。二、大公報的言論，中庸平正，不趨極端，譬如前幾年北平的學生愛國運動，它既能安慰學生，又能解釋政府的環境。這種態度是對的。原來社會上有任何衝突，其曲甚其是，必不盡在一方，評論者的責任，不在助甲而攻乙，乃在公正論斷，使雙方都知道各有其過與不及，從而以

求社會的改善。他們的社評，比較平實而不尚新奇。三、大公報還有一個態度，就是顧全大局。政府有許多地方容可批評，但目的既求政府改進，則其批評，不能採取攻擊的方式，而應為善意的建議，即此所謂「建設的批評」。大體上說來，大公報實是支持政府的。四、大公報在許多重要關頭，常能堅貞地守住一個不變的立場。如西安事變時，大公報竭力反對用武，而抗戰後大公報之堅主抗戰到底，其熱情與信心，非任何報紙所能並論，一個不變的立場，對於一個報紙的言論，十分重要，因為其言論量，常因其立場之一貫而發揮得更淋漓。最後，大公報的社評，不僅其見解平實中正，其氣息文字亦極樸素而無浮油之味。

一般的意見，現在的大公報不及從前，但今日在重慶辦報的環境，却非昔日在天津的環境所能並論。譬如社評，從前大公報的社評，有好幾人執筆，現在祇有一人執筆，其題材與精力，當然發生困難。祇是我們對重慶大公報的社評，非無意見，第一、最近大公報的社評，在題材的分配上，有時不免有過分偏重的現象。我們現正對日抗戰，對敵國的國情，自應盡量宣傳，但也須避免重複，藉以保持讀者心理上的反應力。第二、在外交上，我們現對蘇聯當然應取最友好的態度，但似亦應有一適當的限度，譬如該報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社評「蘇聯的東西騰」，該報容有其觀點與解釋，但讀者中感覺此項論評之超乎限度，恐亦為數不少。又大公報最近之「星期論文」，似亦不若從前。當初原係約定專人撰寫，故在內容上及篇幅上，都能看出被約人物在撰述時

之認真，現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恐怕大多數都是從來稿中選用的，所以有時並非議論的體裁，有時則一文長至七八千字，滿篇統計字數，似亦不合適於作爲一個報紙的「星期論文」，數月以前，我們尙讀到一篇「星期論文」，不僅論調濫俗，其文字亦殊弱劣。我們的意思，此項「星期論文」，必須選約專人擔任，如環境困難，毋需暫時取消，因目前此項沒有精神的「星期論文」，足以影響大公報往日之信譽。

在新聞方面，大公報似另有其方向。他除通信社的稿子外，另外努力「本報特訊」之增加，大概由乎該報外勤記者對工礦農方面，知識與交接較多，所以過去他們對此方面常有許多「特訊」。這種發展的方向是對的。因爲一個報紙的新聞，總應力求與他報有所不同。如篇幅都是「大家有」的新聞，人家何必一定要看你這一家報紙。但大體上說來，大公報的光彩在文章（包括社評與專論），而不在新聞。新聞的編輯方面，雖然「穩重」，而較為陳舊，僅附貽徵任該報編輯時，大公報國際新聞似守有一種趨向于新派的姿態。

最近大公報有兩種新表現，獲得吾人之贊許，一爲「讀者投書」，一爲「渝市點滴」。「讀者投書」在歐美報紙上，不僅佔地甚多，並且非常重要。倫敦泰晤士報上之投函讀者，常爲英國社會上極有聲望之人物，甚至有人其函一經泰晤士報刊載，引爲舉生之榮者。中國社會同西洋社會不同，既無挺身而出有所主張的作風，有地位的人物，聯絡人事尙且不足，怎能發便來發表一無關係的意見？但此種「讀者投書」

顯可舒適社會上若干人士之意見，而作為謀改革的一種參考。報紙儘管大事最好，大事管不了，小事也不妨管管，管總比不管有益於社會，所以最近大公報開創「讀者投書」一欄，實為最可稱贊的一種風氣的開導。其「渝市點滴」，于新聞中摻新了一點批評或幽默，鑄軟硬性於一爐，最為成功。一方面既發揮報紙的功用，一方面又增加報紙的風趣。今日大公報的讀者，恐怕有許多人翻開報紙首先披讀的即此項「渝市點滴」以及「讀者投書」。

作者常覺大公報最有領導及創造的能力。他們似最能（或最肯）運用其智慧。大公報在漢口首先倡行「特寫」的風格，後來大家效行。茲又增開「讀者投書」及「渝市點滴」。在事業的競爭上，走先一着與走後一着，出入甚大。這三種格式，作者昔日亦曾有所主張。但「讀者投書」及「渝市點滴」這種做法，不合於其曾服務之報紙之環境，故碰見而未嘗提議。但「特寫」之方式，遠于二十四五年，即曾建議于其服務之報社。我那時覺得「本市新聞」一欄過於枯燥。主張用軟性的手法描叙若干本市的新聞，如各種社會集會等等，以調和版面的趣味，但當時閱者亦為荒謬，認為正式之新聞篇幅中，焉可輸入此種體裁之稿件，故當時報紙之記敘本市新聞，仍用「徐某某，某地人，年三十餘，住于城南之某某巷」這一類陳腐的章法。不料歸國後披閱漢口大公報，已有此種「特寫」體裁之新聞記述發現，新聞界總算能有進步，亦殊可喜。

吾人對大公報所欲發表之意見，暫止于此。但另有一事

吾人仍有所期於大公報之領導者，就是新聞從業員的特遇問題。據吾人所知，大公報對工作人員之待遇，並不豐厚。吾人對於此事有如下之感想：生活清苦本是從前中國社會上的美德，但中國社會現已日漸趨向于工業化，而與昔日不同。在工業化的社會上，經濟的力量十分主要。新聞事業要求進步，必須吸引優秀而有天才之人才；而近代社會上吸收人才的競爭，經濟是一決定的力量。新聞界要從其他各界，或從政界，或從教育文化界吸收人才，必須能有優良的待遇。譬如新聞記者的待遇如此大學教授高，新聞界自然可望吸收若干大學教授前來參加。今日中國新聞界的進步慢，人才少，待遇菲薄，要係一大原因。新聞事業澈夜工作，已極辛苦，如再待遇菲薄，好的人才，自然難于吸引，或雖來亦必求去。並且現代社會上，一個人社會地位之高下，恆受其經濟力量之影響，新聞記者如收入過微，焉能在社會上發展其活動，而與其他各界人物並肩競爭？即以今日大公報而論，其主筆為國內有數之政論家，而其收入不及行政界中一個科長。又如今日重慶大公報之外勤記者，為中國新聞界中最優秀之記者，且若以進步的觀點而言，他們實為中國新聞界中最理想之外勤記者，以其不備有豐富的常識和熟練的文筆，且有健全之人格與前進之思想也。但其收入，猶不及一個科員。我們認為此種現象，似失公道。據我們的理想，今日中國報界，一個主筆，每月的薪金，應為五百元左右，一個好的編輯不能少過三百元，而一個好的記者，也當在二百五十元左右。事實或不能一下子增加到這地方，但至少亦應較

目前的一般標準，若漸提高。原來新聞工作人員，「質」較「量」更為重要。兩個一百元一月的外勤，未必勝于一個二百元一月的外勤。文章是才智之產物，編輯部聘用人員，應着眼乎才之深，而不求數之多。大公報既為現中國最大最有權威之報紙，似宜在此方面有所表率。一方面，它應當在新開

## 德 侵 丹 挪

芬蘭屈服未久，而丹挪兩國，驟受德軍侵凌。今日國際政治，祇談武力，不講法理。丹挪兩國，愛好和平，文化甚高，世人視為樂土，第一次歐戰時，賴守中立，得免戰禍。此次捲入漩渦，不幸之極。

一九三六年，英法在日內瓦提議取消對意制裁，此後英法威信，在新千底那維亞國家，大為減色。北歐小國，一方對國聯之和平機構，失其信仰，一方對德國國社黨之宣傳，不勝惶恐；即在和平時期，其心理上之不安，已可想見。去年歐戰開始，新千底那維亞國家，竟免戰禍波及，申言維持中立。英法人士，對彼等之隔岸觀火態度，頗有譏評。（參考，Eileen Power, Geneva Impressions, The Spectator, December 22, 1939.）今者丹挪均遭德侵佔，瑞典之放棄中立，恐亦係時間問題耳。

英法對德，預備作持久戰，故採用經濟封鎖政策，以斷絕德國食糧及工業原料之供給。德國需鐵甚殷。憶去夏遊柏

界中領導一種提高待遇的風氣，另一方面，就大公報本身而言，每月若干元負擔之增加，似非不能勝任。第一流的報紙，應當吸收第一流之人才，而使此報之前途，因人才的富有而更得光大。

（四月二十六日）

王繩祖

林時，友人告余，柏林大學門前之鐵柵欄，亦為政府搜去。德國產鐵，供不應求，一九三三年來，擴充軍備，利用瑞典所產之鐵。瑞典一國，鐵苗出口數量，高於任何國家。蓋法美俄三國，產鐵雖多，然皆大部供應本國工業之需求。瑞典鐵苗區域有二，一在北部拉普蘭（North Lapland），地在北極圈內，蘊含鐵成分極多之鐵苗，其數量估計在二十萬噸以上，佔歐洲產鐵總額十分之九有奇。一九三六年瑞典產鐵一千一百二十萬噸，其中三分之二，來自此地，而費於全部運銷國外。運銷口岸有兩處，曰那維克（Narvik）在挪威西部海岸，曰盧里亞（Lulea）在瑞典境之包斯尼亞海灣（Gulf of Bothnia）。盧里亞，一年中有三季結冰，故瑞典鐵苗出口，三分之一，由那維克一口運銷。瑞典之第二產鐵區域，在其國內中部，產量不及拉普蘭，而鐵質純淨過之。拉普蘭鐵苗雖有磷質。瑞典鐵苗，暢銷德英法三國，運銷德國者幾佔輸出總額四分之一。（參考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by a Study Group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xford, 1939, pp. 90-91. 瑞典鐵鑛於德國軍火工業之重要，自無待言。英國欲斷絕挪德之海上交通，使瑞典鐵鑛不能運入德境，故在海上佈置水雷，封鎖海面，而德國方面，因爭此一點，於是先發制人，侵入丹挪。

丹麥弱小，無力抵抗，一日以內，德軍佔有全國。挪威恃有山川之險，雖京都已失，而作戰不懈。英法均有聲明，與之並肩殺敵。

現今英德在那維克方面之海戰，有比之爲一九一六年進特蘭 (Eutaw) 海戰者。進特蘭戰事，僅一日之久，從此德方軍艦，被封鎖在港內，固守黑里郭蘭島 (Heligoland) 亦未敢東窺，一探虎穴。第一次歐戰四年有餘，德國沿海口岸，安然無恙。此次海戰，如報所載，德國大有孤注一擲之概。此次勝負或能影響戰事全局。歐戰相近八個月，德法兩方各有堅固陣線，英法估計，欲衝破德國西線，須付極大之代價，人力損失或在百萬人以上，英法不欲爲此極大之犧牲也，於是有意經濟戰之封鎖政策，外交戰之結好土耳其等等活動。然而曠日持久，難收速效，有欲打破現時僵局者，宜作側面戰爭自北方攻入德國，亦如第一次歐戰時協約國由租打那兒斯方擊敗土耳其，以威脅德奧兩部。故英德海戰又可作爲二次歐戰中之「側面表演」看。英法是否將由丹麥遣兵，以攻德境，吾人斷難斷言，須事態之演變證明之。至於德佔丹挪，破壞中立，此違法之事實，已不能如一九一四

年德佔比利時所引起之驚異，着一九三一年來，國際上不法之事，數見不鮮，故世界人士對於此種非法舉動之反應亦遠不若一九一四時激昂矣。四月十五日草於成都

## 編輯後記

這一期吳恩裕先生的這篇「政治思想中的人性論」是一篇專門的文章，是他在倫敦時研究的一篇文章，（本文是其原稿的譯文）。據本文作者說：斯賓諾莎，盧梭，康德邊沁等之人性論和馬克思的人性觀之關係的研究，是他的導師拉斯基教授所提議的。但研究工作是由吳先生做的，本文所講的仍由吳先生負責。本文原題爲「馬克斯對人性的研究」，因文中涉及其他政治思想家的見解之處甚多，所以改爲今題。希望治西洋政治思想的人，都讀一讀這篇文章。

本期出版時，正是五月。劉振東先生給我們寫了一篇論五四運動的文字。劉先生對這一運動有他特有的感想。

儲安平先生在新聞界服務多年，其經驗豐富及編輯部分的全部領土。儲先生在欧洲時，對歐洲新聞事業曾作細心的研究，所以他對於中國的新聞事業有許多新的概念。儲國後他所提倡並實行的改寫制度（二十七年冬季中央日報國際新聞）得到各方極大的注意。

王繩祖先生是牛津大學文學士，現任金陵大學歷史教授，著有「歐洲近代史」等書（商務大學叢書）

（編者）

# 新評論

(前三期目錄)

# 今日評論

(交換廣告)

社址：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總經理：重慶正中書局  
價目：零售一角全年四元

## 第四期

- 論專家與通人……………吳恩裕  
歐戰中的美國對歐外交政策……………張沅長  
論新縣制的運用……………呂海  
現階段的中日戰局……………葛霽  
日本與米……………劉燕谷  
國際宣傳技術上的三種姿態……………王之一

日五十月三

## 三十卷三期

- 時評三則……………王贛恩  
養士與政治……………伍啓元  
平衡物價與統制需要……………羅常培  
博大多堅貞……………喻明高  
推行公庫制應注意實踐上的問題……………劉錦添  
國營金山莊與華僑前途……………

日一卅月三

## 第五期

-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並附送汪逆「賀勝」一付……………吳敬恆  
論抗戰之影響……………儲安平  
論社會政策……………陳石孚  
立國宜農工並重論……………吳文暉  
書評：浦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吳恩裕

日一卅月三

## 四十卷三期

- 時評三則……………王迅中  
論傀儡政權……………潘光旦  
再論宣傳不是教育……………費孝通  
僱工自營的農田經營方式……………毛樹濟  
談行政計劃……………林庚等  
詩……………

日七月四

## 第六期

- 論中國外交行政……………周子亞  
日本的蠶繭外交……………許汝社  
博覽海峽與近東風雲……………陳運浩  
「我們長眠于此、依舊服從  
斯巴達的法律」(歷史小說)……………高壁

日五十月四

## 五十卷三期

- 時評三則……………徐敦璋  
日敵滅華的政治策略……………王贛恩  
再論養士與政治……………鄭文海  
日本民族的悲哀……………吳傳瑛  
中國法律往那裏去……………

日四十月四